

白鳥庫吉著
王古魯譯

塞外史地論文譯林取輯第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由馬庫書局
正音會譯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白鳥庫吉著
王古魯譯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

第一輯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
初版再版

◆(93252A)

◆G221.0

錢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白鳥庫吉

譯述者 王古魯

編輯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長沙南正路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 馮寶武 沈鴻俊 張叔介)

白鳥庫吉及其著作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史學界受過德國歷史學家李司氏（Ludwig Riess）的影響，發生了極大變動，建樹了所謂「東洋史學」的基礎（註一），人才輩出，成績斐然，而其中最為傑出者，厥惟白鳥庫吉博士。他具有豐富的言語的知識，採用西洋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態度，不甘為傳統的學說所束縛，故對於歐西學者的研究結果，脫卻追隨盲從的境地，而立於再加檢討或批判的地位。研究所得，頗能獨創新說，而與歐美的東方學者爭勝。他所發表的著作，固然『謬戾雖仍未免，而精審處往往過之』（註二），毋怪他對塞外史每有意見發表，歐人頗為重視，甚至他所發表的『黎軒』為“Alexander”的對音；“Tabgac”一語為“Tamgac”之轉，以為“Taugas”即「托跋」二字的對音』（註三）的主張，歐人亦有發表此類主張於其後者（註四），即此可見白鳥博士在世界學術界中亦有他相當的地位了。

我們假使從他的經歷來看，他所研究的範圍和途徑，極為明晰。大致出發於西洋史日本史，轉而研究朝鮮史地，漸次推及東三省、蒙古、西域方面。因為他致力之勤，發表的論文極多，可是大都散見於各種雜誌之上，從未刊行過單行本，所以中國的讀書界，很少讀到他著作的機會。他是生於慶應元年（孝明天皇的年號，相當中國咸豐四年，公元一八六五年。）二月四日，本年已有七十一歲的高齡了。明治二十三年（相當中國光緒十六年，公元一八九〇年）卒業於東京大學（東京帝國大學的前身）史學科，不久即任

學習院教授。當時他所擔任講授的課目，以西洋史爲主，旁及日本史，恐怕那時候就是他本人，亦沒有豫想到後日竟在東洋史方面享有盛名的吧？可是時機之來，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之外。學習院高等科方面，因受當時「創設東洋史運動」的影響，決定在中國歷史之外，添設東洋各國歷史一項課目。原擬中國歷史教授市村瓚次郎氏兼任授課，但市村氏以事堅辭，白鳥氏斯時既身任歷史地理課課長（「課長」相當「主任」）自不能不勉爲其難，先自朝鮮歷史開始，親自講授。此種因職務的轉變，使他研究的興味，亦改變方向。此種轉變，可說是從此奠定了他一生研究的基礎。其後因研究朝鮮史地，而感覺到研究東三省史地的必要，由此遞嬗，轉而致力於西域史地，此種研究徑路，從他所發表的著作來看，亦顯然可分，毋怪市村博士亦目此種轉變爲東洋史學家白鳥博士出世的端緒了（註五）。

在他畢業於東京大學的前一年，東京大學文科大學裏的教授和學生，發起創立了一個史學會（註六），刊行史學會雜誌（今名史學雜誌）月刊，他即被推爲編纂委員之一。因之，最初十年之間，所著論文，大都在這個雜誌上面發表。而且在他研究興味未轉變到朝鮮史地方面之前，所發表的文章，僅有歷史と地誌との關係（第一編第一號）及歷史と人傑（第三號）二篇，其注意力尚未灌注到專門問題，顯然可見。可是自從他在史學雜誌第五編第十二號上發表了朝鮮古傳說考之後，以迄今日，除少數應酬文字而外，大都集中於上述的幾方面，一按本文文後所附的白鳥博士著作年表即可明瞭的了。他對於塞外史研究的論文，最初發表的，是匈奴は如何なる種族に屬するか（載明治三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七年）的史學雜誌第八編第八號）突厥闕特勤碑銘考（載史學雜誌第八編第十一號）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載史學雜誌第九編第十一、十二號）三篇。其中最值得提及者，就是突厥闕特勤碑銘考。因爲此文與後文所述的匈奴及東胡諸族語言考，同於公元一八九九年提交

萬國東方學會(是年在羅馬開會)宣讀，引起世界各國東方學者注意，而使白鳥氏一躍成名的。案闕特勤碑銘，於公元一八

九〇年在鄂爾渾河 (Orkhon) 河畔爲芬蘭人 海格爾氏 (M. A. Heikel) 所發見，碑成四方的石柱形，除石座外，

高約一丈九寸五分六釐，在七尺六寸二分三釐之處，四面均刻有文字(東、南、北三面爲葉尼塞文字，西面則爲漢文)，碑銘係唐玄宗開元

二十年 (公元七三三年) 所撰(註七)，而墓中人闕特勤，則爲骨咄祿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漢文碑銘，曾於公

元一八九二年由海爾新福 (Helsingfors) 芬蘭畏吾兒學會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刊行，

題爲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recueillies par l'expédition finnoise en 1890"。歐西學者，如 "Gabelentz", "Schelegel", "Radloff", "Wassilyeff" 等，紛紛譯述考證，錯誤之處，在所難免，白鳥氏此考，用意

即在彙集各家之說，而考訂其是非。所以在萬國東方學會中提出小冊 "Die Chinesische Inschrift auf dem

Gedenkstein des K'ite Te K'in am Orkhon, übersetzt und erläutert" 之中，首述各家的譯文及說明，然

後提出本人的譯文全文，並加考證，末附各家及本人的譯語對照表，俾讀者可以辨別正誤。與此考同時提出者爲

"Über die Sprache des Hing-nu Stämmes und der Tung-hu Stämme" (匈奴及東胡諸族語言考)。

(註八)此文以原稿提出，原定委托日本出席此會會員坪井九馬三博士代爲宣讀，後因夏德氏 (Friedrich Hirth)

對於此文，極感興趣，自告奮勇，代爲宣讀。夏德氏復與拉德洛夫教授 (Prof. Radloff) 熟商，將此文掲載於彼得

堡的學士院雜誌 (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 Science) 十三卷二期(公元一九〇〇年)，從此歐西學術界亦知日本

有白鳥其人了。提出上述二篇論文於萬國東方學會的翌年，即得日本博士會的推薦，白鳥氏獲得文學博士的學

位。明治三十四年（公元一九〇一年）奉學習院之命，赴歐洲各國留學，使白鳥氏對於中亞各國言語，獲得學習的機會。先至德國柏林，受學於地理學地質家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並在東洋學校中學習土耳其語；復往匈牙利，在婆達倍斯（Budapest）繼續學習土耳其語，兼習匈牙利語，留匈期內，將前載史學雜誌的烏孫に就いての考，譯爲德文，揭載於婆達倍斯的學術雜誌東洋評論（Keleti Szemle）。同時上文所述的匈奴及東胡諸族語言考又爲匈牙利學士院的人類學雜誌（Etnographia）譯載，並附加匈牙利博士著名的芬蘭畏吾兒（Finn-Ugri）研究家蒙加契（Dr. Munkasci）的評語，頗引起匈人注意（註九）。匈人原係東方人種，所以對於烏拉爾、阿爾泰民族的研究，極爲盛行，學士院所刊的東洋評論，專載此類文字，而寄稿者大率爲各國著名之士。例如德國的夏德、福埃（Foy）、馮克勒爾（Winkler）、丹麥的湯姆孫（Thomson）、俄國的拉德洛夫等，白鳥氏抵匈後，亦屢有稿件投載，據其調查，匈國圖書館中，絕無論及中國與日本的書籍，但敘述侵入西洋的亞細亞民族的書籍，則觸目皆是，故當時白鳥博士蒐購書籍雖多，然尙以「限於經濟未能多購」爲憾也。留匈期內，亦曾隨東洋學校中的教授學生，同遊土耳其、保加利亞各地，以廣見聞。一九〇二年萬國東方學會在德國漢堡開會，日本學者參加者共十人，白鳥氏亦與其列。此次爲白鳥氏首次參加此會，在會中所宣讀的論文爲烏孫考及朝鮮王號考（二文均用德語。後者曾刊載於一九〇三年三月的東洋評論上，其匈牙利語譯文，則載於婆達倍斯的人類學雜誌上。）在開會期內獲得接觸各國碩學之士的機會，並與夙日慕名的夏德氏、湯姆孫氏、拉德洛夫氏訂交。會後即赴法國巴黎，在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及東方語言學校（L'École de Langues Orientale）一校學習東洋語學，並與沙畹教授、高迪歐教授、婁維教

授等過從甚密，獲益不淺。其後又遍歷英意土及東歐北歐諸國，於明治三十六年（公元一九〇三年）十月返日。返日之後，鑑於東洋史地研究的需要，即與學界名流合力提倡，創設亞細亞學會（註十），以種種關係，未能有所進展，至明治四十年得平田東助、伊東忠太博士的斡旋，與當時桂太郎伯爵所主宰的東洋協會（註十二）合併，擔任該會學術上調查事業，定名為東洋協會學術調查部，自任主任，並於明治四十二年（公元一九〇九年）七月發行東洋協會學術調查報告，不久即得法國銀行家阿爾倍爾·康（Albert Kahan）氏資助，開始刊行學術雜誌東洋學報（年出三、四期不等，至今繼續刊行，現已出至第二十三卷第四號），使之克享學術界盛名，不能不說是白鳥氏提倡維護的功績不小。日俄戰後，日本既已決定創設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開始經營南滿。白鳥氏得當時文部省次官澤柳政太郎氏的介紹，又向滿鐵首任總裁後藤新平、男爵建議在社中創立學術調查部，調查東三省、朝鮮的歷史地理。他所以有此建議者，完全出於下列二種見地（註十二）。其一謂出於經營滿韓的實際需要，所以他說『我人苟念及半島國之與我國有密切關係，古今無異，而半島上風雲的動搖，亦常起於滿洲曠野之間，因而念及滿洲有關我國國運消長，亦古今相同。則究明滿洲方面民族競爭真相，知悉現時形勢的由來，治世者亦豈能等閑視之！』其一則謂出於純粹的學術的見地，所以他說『歐西學者努力於研鑽東方學方面，已有多年，凡自然界現象，以迄人種、言語、宗教、學術、文藝等，經彼等闡微顯幽者甚多，而其研究的地域，無論波斯、印度，即中央亞細亞以迄中國老文明國；西伯利亞曠野以迄安南半島，全亞細亞各地，彼等所嘗試的學術上研究功績，真可驚歎，日本學者，實多依賴西人之教，始得知東洋之事。我人對於歐西學者固抱極度尊敬與感謝之念，同時思及東洋國民對於世界學術方面貢獻甚少，尤覺慚

愧不勝。至於滿洲朝鮮，因其地處僻遠，尙多西人未加討究之處。今日此二地域，幸已開放於我學界之前，我人如欲研究我國國民地理上文化上關係，亦得特殊利便，我國學者，其勿失此良機！此種措辭，在戰後日人大陸發展的氣勢高潮之際，自易動聽。後藤氏即於會社之內，添闢調查部，囑托白鳥氏爲主任，並由白鳥氏招集池內宏、箭內互、松井等、津田左右吉、稻葉岩吉等數人分任調查研究。他們在調查研究之先，就豫定了兩個方針：（一）闡明滿韓歷史的地理；（二）由近代推及上代。關於（一）項方面，他們的理由是因爲歷史的基礎，在於地理，地理如不明，則史實無從探究。關於（二）項方面，上代事蹟，史籍甚少，研究不便，而近代則材料比較豐富，故先事研究，然後追遡上代，他們認爲此乃最適當的順序。方針既定，於是池內氏在白鳥氏指導之下，開始研究。研究所得，首先發表者，即爲滿洲歷史地理二冊及朝鮮歷史地理二冊。此種事業，繼續從事者七年，後因會社總裁屢屢易人，當局對之興味淡薄，遂以此種工作委托東京帝國大學，仍由白鳥博士主持其事，每年刊行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一次，以迄今日。報告之中，所載論文，精采者頗多，亦曾引起我國學者注意，王靜庵氏且摘譯數篇（觀堂譯稿下，收津田氏室箭內互氏雜觀考三篇譯文。）介紹，其價值於茲可見，毋怪和田清氏稱譽白鳥博士爲「研究滿蒙史的日人之中，最大的功勞者」（註十三）了。大正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被推爲日本帝國學士院會員，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奉東京帝國大學之命，考察歐美各國學術界情況，適亞細亞學會舉行成立一百週年紀念會，白鳥氏即代表東京帝國大學總長出席，宣讀祝文，並於部會之中，宣讀“Sur l'Origine de Hiong-nu”（匈奴起源考）論文。會後遍歷美、法、英、德、荷、澳、意、埃及等國，所過各都市，凡歐洲東方學者的著作，均詳爲蒐集。過荷蘭海牙時，且與記錄局交涉，抄錄

有關中日的文件而歸。十三年歸國，適岩崎家收買莫理遜文庫之後，業已決定開設東洋文庫，並決定分設圖書部及研究部，乃商諸白鳥博士，請其主持研究部事。白鳥博士即爲之計劃一切，招集研究人員，出版「普通書店所躊躇顧慮銷路，不敢冒險刊行」的書籍及研究作品（註十四）。十四年壽臻還曆，所任東京帝大講席，例應停職，從此捨棄教授生活（東京帝大專之，爲名譽教授），專心主持東洋學報及東洋文庫研究部，且於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起，在東洋文庫中開設東洋學講座，除本人演講塞外史一類問題外，廣聘學者主講，每年舉行三四次不等，以迄今日，裨益學子，實非淺鮮。博士雖常自謙，早年頗怠於學問，然卒業大學之後，始終一貫，孜孜矻矻，研求學術情形，成績歷歷可尋。其所以能有如此成就者，端賴語學方面有相當根柢。卒業大學之時，雖僅通英、德兩語，其後續學法語、朝鮮語，初次留學歐洲之際，又學土耳其語、匈牙利語；歸國之後，再學俄羅斯語、滿洲語、蒙古語。前後所學，不下於十種語言，故對於西人所著有關東亞方面的著述，無不寓目，於是所見日廣，而著述日益豐富了。

一如上文所述，白鳥氏研究的範圍極廣，三四十年来所發表的論文極多，除若干專論中國上古史的問題外，大體以中國塞外史地爲研究問題。其摯友市村瓚次郎博士曾敘述白鳥氏研究概要於白鳥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の序に代ふ（註十五）一文中，簡而扼要，爰轉引其語於下：

『博士的研究範圍，可分「東」、「西」、「南」、「北」四部觀察。東部又區分爲三：第一爲朝鮮；第二爲滿洲；第三爲日本。北部爲蒙古民族。西部爲中央亞細亞及西南亞細亞民族。南部則僅僅研究亞細亞南部一小部分而已。』

〔東部〕

關於朝鮮，白鳥氏首先批評「檀君開國說」，目爲出於後人的假托，其後又對於箕子的傳說，亦考證爲並非歷史的事實。繼又考定漢武帝時所置朝鮮四郡的境域，斷言九都城與國內城的位置是一非二，並以此定今日的輯安縣。此外，進一步研究朝鮮語的系統，最初主張朝鮮語與日本語屬於同一系統之說；其後一變舊說，論斷朝鮮語與日本語系統完全相異，應屬於烏拉爾阿爾泰語族（Ural-Altai family），並以爲「諺文」（朝鮮所製之文字）最初亦曾受蒙古文字影響，往後始出於鮮人獨創云。關於滿洲，白鳥氏曾證明古代穢貊與肅慎、靺鞨同屬通古斯民族，並考定唐代的流鬼國，卽爲今日的庫頁島。又曾親身實地調查，確定寧古塔南方的東京城爲渤海上京龍泉府；阿勒楚喀南方的白城爲金代上京會寧府。關於日本，則從言語學的立場，論證日本民族爲世界上特異的民族，並主張「用記」（指古事記）「紀」（指日本書紀）的「神典」來解釋民族的由來，並不妥善，因爲此種神典係一種神話，乃是用來描寫國家的尊嚴及其由來的；此外又對於魏志倭人傳及梁書的扶桑國等記事，發表新穎意見。

〔北部〕

歐洲學者之間，久成論題的匈奴，白鳥氏最初斷定其爲突厥種，其後重行斷定爲蒙古種。至於東胡，則以爲原係蒙古種，多少雜有通古斯種的血液；且斷定烏孫爲突厥種。此外，對於被稱爲韃靼的部族，論證其一律爲蒙古種；及至最近，又斷定獵狁爲突厥種，與匈奴種族相異。

〔西部〕

主張大宛的貴山城爲「Kāsān」，康居住地，爲黠戛斯平原，而康居民族則爲突厥種。康居問題，駁斥了歐人所比定爲「伊蘭民族住地的『Sogdiana』」之說。對於塞民族，以爲見於漢書中的塞族，爲天山北方

的突厥民族，而侵入印度的“Saka”，則爲阿富汗的伊蘭民族，闡明二者之間，絕無任何關係，推翻了歐西學者的「塞與“Saka”爲同一種族」之說。對於大月氏與大夏的關係，他又發表新說，主張「大夏即指“Bactria”，而係“Tokhāra”的譯音。但“Tokhāra”係民族的名稱，即係月氏。月氏原爲河西地名，此地住有突厥種的“Tokhāra”民族，漢人仍以原住地地名呼之，而以此名與大夏是二非一。」又考定迦膩色迦王的年代爲公元二世紀中半，並自闐賓的形勢上推測，對於魏略所記有關佛教東漸的記事，大生疑義，乃論斷侵入印度的“Kushan”（即貴霜欽侯）爲伊蘭種的土著人民，雖曾服屬於大月氏，但並非同一民族。此外又主張闐賓在漢代，指“Gandhāra”，其首府修鮮城，即爲“Susan”（即 Puskalawati）；比定大秦國爲埃及的“Alexandria”，論述魏略及魏志中所載大秦國的風俗等等，係漢人運用中國思想所構成的空中樓閣之談，並以爲「大秦」及其都城「安都」的名稱，亦不外乎淵源於此種思想。博士對於北狄及西域諸問題，殆以全力傾注，從事解釋。此種情形，不僅是他因爲歐洲東方學者對於此一方面頗多論述之故，企圖與之對抗；而主原因，完全在於他依據他的「東洋史必須以漢民族與北方民族的勢力消長，及漢文化與西域文化間交涉關係爲中心」的主張，纔向這兩方面盡力開拓的。

南部。從來絕少研究，最近纔始對於赤土國，提出創見，論證其爲蘇門答刺的東南部，將來對於此方面，或再有研究，亦未可知。」

白鳥氏的研究方向，就上引文中，已可約略看出。他的不甘爲傳統學說所束縛的態度，亦曾引用到研究中國古代

史方面，引起過日本二大學派對於先秦天文曆法的論戰。我在明治維新以來日人研究中國學術的趨勢（註十六）中，曾經這樣地敘述過：

『東洋史學派以東京帝大教授白鳥庫吉氏爲中心，其研究態度，不甘爲傳統的學說束縛，對於中國文化，以精細的目光觀察，自由批判解釋。市村瓚次郎氏、林泰輔氏，與此派雖似接近，但二人見解，極爲穩健，尙不能完全出於解放自由態度。故有時與白鳥庫吉氏等主張不能一致。而支那史學派，則純粹以京都帝大教授內藤虎次郎氏、狩野直喜氏等爲中心，富於清朝考證學派的色彩。此二派立場不同，故見解時有相異。而二派之爭，則始於白鳥庫吉氏所發表的堯舜禹抹殺論，此係東洋協會評議員會上的演講詞，全文於明治四十二年八月東洋時報第一百三十一號上刊載，改名爲支那古傳說の研究。關於堯舜禹是否係歷史上實有人物，我國顧頡剛氏十年前亦曾有所論及，已引起各方辯難，而白鳥氏此說，尙遠在其前，自然要引起傳統的學者指摘了。首由後藤朝太郎氏發表堯舜禹の抹殺に就て（見東洋時報一二九號）繼由井上哲次郎氏發表支那古代の研究（見漢學一編五號六號）林泰輔氏亦陸續在東洋哲學第十七編第一號，漢學第二編第七號，東亞研究（此係漢學雜誌的改名）第一卷第一號，第二卷第一號，對白鳥之說，加以反駁。而林氏主張，較爲有力，其反駁論據，大致謂「堯典的四中星」的記事，即係記錄當時觀察天文的情形，據此可以明瞭堯典所傳，確係古代事實，而且西歐的東方學者，如中國天體論（*Uranographie Chinoise*）的著者“*Schlegel*”等信之者頗多，即日本那珂氏，主講中國古代史時，亦未否定此項記事。於是白鳥氏弟子橋本增吉氏，即於東洋史談話會（明治四十五年二月）席上發表虞書に就きて，根據天文學上

的事實，指出堯典四中星記事，完全後世僞作，出爲其師聲援。而白鳥氏本人亦於日本學會例會中，發表儒教的源流；漢學會中發表尚書的高等批評，駁復林氏。據彼之說，四中星無待天文學上的研究，已可明瞭其完全僞作，因其記事淵源於陰陽思想之故。尚書的高等批評載東亞研究二卷四號之後，林氏又於東亞研究二卷九號（大正元年即公元一九一二年七月）發表再び堯舜禹の抹殺論に就て，加以反駁；儒教的源流在東亞之光七卷九號（大正元年九月）發表之後，林氏亦即在此誌八卷二號（大正二年九月）刊布儒教的源流を讀む，再加以痛擊。因論堯舜禹是否爲歷史上實有人物？於是涉及堯典四中星記事，其影響所及，遂有飯島忠夫所著漢代の曆法より見たる左傳の僞作（明治四十五年即大正元年東洋學報第二卷第一號第二號）的發表，引起京都支那史學派新城新藏氏著支那上代の曆法（見大正二年藝文第四卷，洋學報第二卷第一號第二號）的發表，引起京師支那史學派新城新藏氏著支那上代の曆法（第五、六、七、九號）大加反駁，軒然大波，從此發生了。案飯島氏之說，初不過引仲康有爲氏所謂「劉歆僞作說」而已，而新城新藏氏則就堯典四中星記事，從天文學方面，加以研究，同時論及詩經、春秋、左傳，似未能斷爲後世僞作。於是橋本增吉氏又發表書經の研究續篇（東洋學報第三卷第三號，第四卷第一號第三號），反駁新城氏。雙方爭辯，至今未已……白鳥氏既於昭和四年（公元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史學會例會中，演講支那古代史に就て，復於五年五月起，在東洋文庫中連續演講支那古代史の批判（共七），重行提出「夏殷周三代抹殺論」論據，使歷來論辯未已的問題，更形短兵相接……」

他的「堯舜禹抹殺論」，引起了疑古、尊古二派的論爭，一如上述。而白鳥氏對於其他方面所創的新說，亦曾引起不少反響。例如比定貴山城爲「Kâsân」，則日本有桑原隲藏博士發表反對意見，極力主張應比定之爲「Khu-

“jandah”。至於匈奴及東胡、烏孫等考證文字，對於歐洲學術界，亦引起了不少波瀾。關於此點，市村博士說得很清楚。他說：

『西史的“Huns”爲東方人種，固已明瞭，但究屬於今日的何種民族？尚未獲得明確判斷的資料。自從特·基鈕（Joseph de Guignes）氏首倡「西史的“Huns”爲漢史的匈奴」以來，近一百五十年，此一問題，已成歐洲東方學者的研究對象。主張匈奴爲“Turk”種者，爲克拉普洛忒氏，他的論據，祇有一點，就是說，匈奴語稱「天」爲「撐犁」（即Tengri）與後日“Turk”人稱「天」之語相同，白鳥博士於明治三十三年所撰的匈奴及東胡民族考（即前文所述的匈奴及東胡諸族語言考）中，進一步蒐集許多匈奴語，用“Turk”語解釋，提出此篇論文於羅馬萬國東方學會之中。即得夏德、拉德洛夫諸氏的推獎，將此文在俄國學士院雜誌上發表。其後，博士從言語上發見「目匈奴」爲“Turk”種，似非妥善，」另創新說，主張匈奴爲蒙古種，在史學雜誌及東洋學報上發表，尙未爲西人所知。大正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博士親赴巴黎參加亞細亞學會，在會內朗讀匈奴の起源論文，公開發表其說，主張匈奴大體爲蒙古種，多少帶些通古斯種的血統，並且對於歐洲東方學者所主張的「Turk種之說」，加以批評，指摘其不當，大起歐洲東方學者的注意。當時其中如伯希和氏對於博士意見，表示贊同，可是其他大部分的學者，仍固持「Turk種之說」。

匈奴究屬何族？牠與西鄰的烏孫、月氏、康居等族，亦有相當重要的關係。主張烏孫、月氏、康居爲白色人種的，爲克拉普洛忒氏及婁密塞（Abel-Rémusat）氏，其後因探險新疆而獲得發掘物，更使西洋學者，對於此說，增加

信仰。可是博士於明治三十五年掲載烏孫考於匈牙利的東洋評論，將烏孫語與“Turk”語對照，證明其爲“Turk”語。其後西洋學者之間，對博士所列舉的“Turk”語，或以爲此乃烏孫自鄰近的“Turk”人處所借用者；或以爲烏孫原係白色人種而“Turk”化者。博士的康居考及粟特考，已用英文發表，他日或者成爲歐洲學者間討論的問題，未可知也。

據白鳥博士之說，占據亞細亞北部的民族，雖是隨了時代而必有多少移動無疑，但其大體的位置，卽目爲絕無變化，亦無不可。住居長城之東北者，爲通古斯族；其西方爲蒙古族；更西則爲“Turk”族。其位置今昔似並無多大相異。現今的歐洲東方學者，既然認定「位居其中間部分」的匈奴爲“Turk”族，所以不能不目其西鄰的烏孫及月氏、康居等族爲白色人種。可是如果目匈奴爲蒙古種，則其西方的烏孫、月氏、康居等等，自不能不目爲“Turk”族了。所以目匈奴爲“Turk”種，或目匈奴爲蒙古種，對於亞細亞北方民族的歷史有莫大的影響。」（註十七）

白鳥博士論著的範圍以及見解，概如上述。比聞雖已壽逾古稀，精神尙矍鑠異常，甚冀其能繼續發表創見，一新世人之耳目焉。

博士著述甚夥，散見於新聞雜誌之中，白鳥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大正十四年即公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出版，故最近十年間所發表的著作，並未著錄）中曾掲載白鳥博士著作年表於卷首。茲根據此表，略爲增損如左：